

亂世求存秘笈

馮進



剛過去的二〇一六年國際風雲突變。死傷慘重、接二連三的恐襲，鋪天蓋地的難民潮，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選等等，都讓西方世界的民衆普遍感覺亂世降臨，「找不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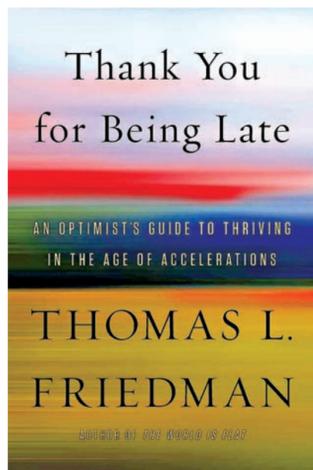
《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者、三次榮獲普立茲大獎的佛萊德曼 (Thomas Friedman) 親身自任，希望通過新作《多謝你遲到》(Thank You for Being Late) 給二十一世紀讀者寫一個分析當前世界的運轉規律，並提供應對策略的「大專欄」。他曾出版過包括《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 在內的六本暢銷書。本書書名來自他碰到客人遲到時說的客氣話。幾次下來，他發現客人遲到的那幾分鐘給他提供了在繁忙生活中暫停、思考的機會。思考的結果，就是這本他稱爲「一個樂觀主義者」著述的「在加速年代謀求發達的指南」。

本書的中心意思非常簡單：當今世界的三大力量：科技(電腦)、市場(全球化)和自然(氣候變異)都在同時高速發展。三者的合力組成了「超新星」式平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五大關鍵領域：職場，政界，地緣政治，倫理和社區。

作者把二〇〇七年視爲巨變開始的節點。這一年起，電腦技術呈「指數」發展。蘋果手機、安卓系統問世，電腦的晶片、軟體、儲存、感測器、聯網技術都同時發生巨大提升，由此帶來前所未有的巨變。

英特爾(Intel)公司的創始人之一摩爾(Gordon Moore)的「摩爾定律」(Moore's Law)預測：電腦微晶片(microchip)的能力每兩年就能翻倍。佛萊德曼說，如將電腦技術的變化速率用於轎車生產，那大眾甲殼蟲車從一九七一年出廠發展到現在，每輛會只賣四美分，每小時能開三十萬公里，加滿一箱油可以開一輩子。科技與全球化、氣候變暖的力量結合在一起，帶來更令人震驚的巨變。如，某個三十六歲的英國人在家中稍做手腳，就可以讓美國的道瓊斯指數瞬間猛跌百分之九。

面對巨變的世界，我們難免頭暈眼花，倍感迷惘。從前適應社會變化需要



▲ Thomas Friedman 著《Thank You for Being Late》

資料圖片

幾代人的努力，十九世紀起只要一代理人的奮鬥就行。現在我們可能只需十到十五年時間就能適應社會變遷。然而，這種速度依然跟不上外在世界的運轉。全球化可能帶來截然相反的結果。它既能讓我們聽到世界最小的聲音，也可能將權力集中到幾個跨國集團手裏。而美國人聽任科技主宰生活，沒有及時學習、提高。作者稱，要在當今的世界安身立命，只有提高自身的適應能力，不斷創新與自我反省。爲寫本書採訪多人的過程中，他更深體會到個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重要性：一起競爭，發明，創造，合作，才能讓人類更有創意，更堅韌，也更興旺。

此書前半部分說明當今世界巨變的根源，深入淺出，讓人難忘。後半部分就不免淪爲老生常談。不過，我覺得此書的一大看點是一開頭作者揭祕寫出好專欄的訣竅。他說，好的專欄不光提供資訊，還要產出「發光發熱」的觀點；作者要在讀者腦海裏點亮一盞燈，在他們胸中點燃強烈的情感，促使他們從嶄新的角度來認識、分析世界。有書評者批評此書缺乏新意，作者只不過重複了他說過多次的「鄉談俚語」。但我認爲佛萊德曼擅長在文中化繁就簡，正體現了他身爲專欄作家在讀者群中發光發熱的巨大能量。

責任意識

嚴陽



最近一次檢查身體，忽然發現自己的血壓高得離譜，血脂等指標也有問題，這讓我立刻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之中。之所以如此，卻並不是因爲我害怕死亡，而是我對於父母、兒子與孫女十分牽掛：假如一不小心我真半身不遂了甚至掛了，那麼，我自然無法爲我年已九十出頭的父母盡孝，也不能爲我的兒子女兒們盡孝了！

我深深知道，有生必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也無論是什麼人，即不管你是腰纏萬貫的超級富豪，還是叱咤風雲的政治人物，還是萬千追星族追捧的影視歌星，最終都會「塵歸塵，土歸土」。不僅如此，我身邊也不乏本不該那麼早就過世的人們：我一個高中同學，與我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後同一年考上大學的，但他三十多一點的年紀上竟然死於一場十分意外的車禍：一次他坐公共汽車，因爲前面的座位空着，他便挪到了前面，而另一輛汽車攔腰撞來，恰恰撞到了他；而在車禍之前，有消息說他即將被提拔爲某中專學校的副校長。與我同一年調入同一學校的某同事，九十年代初停薪留職下海辦企業，在新千年之初已經擁有了上千萬資產的身價，但一場中風讓他在四十出頭的年紀上便撒手人寰。我讀大學時的一位同學，後來成爲我的同事，與我還在同一辦公室一起工作多年，五十多一點的年齡在單位組織的旅遊活動中出了一點意外——從某個滑道上摔下，竟然在數年之後死於腦萎縮。

我不認爲與這些我昔日的同學、同事等人相比，我真有多少理由應該活得更長。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作爲我，對上、對下因爲承擔着太多的責任，活得很累；那是事實：我父母那樣年輪的老耄老人，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方面是因爲他們這年齡的人個性和思維很難改變，你只能努力去適應他們而不能改變他們，所以，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委屈自己；另一方面逐漸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他們，一步一腳真的離不開你——幸好我們姊妹有

四人，可以四個月一輪，其他人在非任職期間可以得到些許調節。但是，因爲兒子那個小家同樣需要我們幫忙，所以，另外三個月的生活依然高度緊張：雖然他們的經濟條件尚可，可以聘請保姆，可單單是保姆家裏有好多事依然轉不過來，需要我們增援。當然，不能不說的是，我們的孩子生活技能上的不足，也是讓我們在他們已經成了爸爸媽媽之後依然甩不開手的重要原因；對此，我們必須認真反省與檢討過去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缺失。

所以，當某些日子自己身心俱疲的時候，對於疾病乃至死亡我真的是無所畏懼。但是，想想自己對於父母、對於下一代所承擔的責任，真的又讓人有些畏首畏尾。

我以爲，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承擔着一定的責任乃是毫無疑問的，並且我們這責任來自於我們不同的身份或者說角色。就在一個家庭中的角色來說，對於父母，我們是兒女。作爲兒女在父母逐漸老去，需要我們爲其提供更多的幫助——通俗地說則是養老送終的時候，我們義不容辭。也可以說，假如沒有我們的幫助，他們晚年的生活品質必然會下降、會出現種種問題。比如說我父母，我母親體力還行但身體不行，我父親身體還行但腦力不行，如果沒有兒女的照料，那麼，他們恐怕只有進養老機構這一條路。而養老機構即便條件再好，能夠有家庭的溫暖嗎？

對於我們的兒子來說，我們是父母。作爲父母，我能感覺到的是，作爲「八〇後」的他們與我們當年有些相當的不同——他們生活在一個屬於市場經濟與高度競爭的時代，工作壓力與生存壓力遠非從前那個時代所能相提並論。如果沒有我們的支持，他們必將存在更多的後顧之憂，甚至於誇張一些到嘴說，一日三餐他們不能順利地吃都是極大的問題——速食與外賣可以解決一時的問題，但能一輩子靠吃速食、吃外賣生活嗎？

一個人不能只爲自己活着，更應該爲別人活得更好而活着。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對於一個具有一定責任意識的人來說，你不能不珍惜自己的身體。

兩百年與五千年的對比

小冰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這個名字大響，不用文物部門印多少宣傳冊子，單憑參觀者口口相傳，已經讓世界遊客不請自來。

位於紐約中央公園旁邊的大都會博物館，與倫敦大英博物館、巴黎羅浮宮並稱爲世界三大博物館，是收藏五大洲文明，匯集世界文物精華的巨大寶庫，珍品包括梵高、莫奈、畢加索等著名藝術家的作品，都是名畫真跡。親臨展覽現場，即便在電視上看過無數次的人，心中也會升起不期而遇的驚喜。

中國館的文物佔全館文物的比重得，一萬多件，件件都是中華文明的藝術精品，珍貴得很。文明古國的隨便一片瓦礫、一個石器、一塊布，來到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美國，都令當地人刮目相看。展品從商朝的青銅器、戰國的木俑、北魏的銅像，到唐代的冥器陶製牛車、宋代的木雕觀音像，以至清代的乾隆畫像等。其中最爲震撼的，是來自山西省紅洞縣廣勝寺的大型壁畫「藥師佛佛繪圖」，博物館爲壁畫量身定做展廳，那是全館最大的展廳。

那天在館內，看見參觀者中有一對父女，那女孩還是個活潑的小學生。她爸爸問她：「美國的歷史有多久？」「兩百多年。」女孩及時作答，以示敏銳。「中國的歷史五千年。」「五千年？」女孩聽得好驚訝，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張開好一陣子才合攏，她以爲聽到天方夜譚了。一路聊着看着，父女倆走向展品，閱讀旁邊的說明，一唱一和、聲情並茂，情景令人感到溫馨。看得出來，那女孩對中國古文明的崇敬之情，此時此地已經在心中萌發。

博物館展覽，不需要花太多的錢，影響卻很大。對於西方人，效果好、易接受。這是博物館的精髓所在。真正的藝術文化來到美國，是能夠弘揚的，美國民衆是能夠欣賞的，能夠接受的。

大都會博物館的門票價格自定，那天我們忽略了這個細節，Joy直接去售票窗口買票，售票員提醒她：「學生可以選擇購票或者不購票。」於是我們只買了一張成人票，又象徵性地投了一點錢進募捐箱。自己買票，自覺地買票，如果覺得囊中羞澀，也可以不買，他們好像只管傳播文化。

我們在裏面走走看看，走到哪兒看到哪

兒，累了就坐下來，即便坐下來也是滿目的珍寶，非常有看頭。一時間，我感到資訊來得太太多太快，有點應接不暇。原來這些東西都在這兒啊！

看見自己國家的文物在他國展出，心情是複雜的。他們是怎樣搞到手的呢？面對文物，我想到它們的前世今生，想到它們的出生地，還想到它們怎麼就莫名其妙地穿越時空，跑到美國。這是一個有不同答案的問題，有的人說是驕傲，有的人說是恥辱。說驕傲的人認爲，這是西方人對中國文化的認可，應該引以爲豪。說恥辱的人認爲，這是被欺詐被侵略被凌辱的結果。是的，怎樣解釋，要分地區時代原因，以及是誰做解釋，也就是西方人常說的幾個W：where、when、why、who。就文物而言，能完好地保存，讓世人能領略到人類文明的悠久燦爛，或許是最重要的。

走出博物館，已是下午四五點，廣場的階梯上坐滿了觀衆，那裏有表演。我們找到空位席地而坐，一邊吃乾糧一邊看演出。三四個南美正在表演他們傳統的打擊樂，激情很高，煽動性很強。那是一種另類的文化傳播。

趣談外交官

潘正秀



外交官是代表一個國家到另外一個國家處理各種雙邊和多邊事務的官員。他們身負重任，經常出入國門，走南闖北，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一談起外交官，社會上一些人總認爲外交官西裝革履，整天在宴會中高談闊論，觥籌交錯，或是遊山玩水，享受閒情。殊不知，外交官身在異國他鄉，政治上要經受各種考驗，工作中要應付預想不到的情況和處理各種錯綜複雜的問題，生活上嘗盡酸甜苦辣。一些外交官戲稱這好比是「洋插隊」。工作緊張時往往不分晝夜，沒有節假日，有時要面對艱苦環境、疾病，甚至生死的考驗。

當然，各國因國情不同，選擇外交官的條件有所差異，但無論哪個國家，一個成功的外交官都應具備立場堅定（只是不同的國家對「立場」的標準不同）、品德高尚、博學多才、思路敏捷、能言善辯等基本素質。在近四十年外交生涯中，我們夫婦曾先後到過幾個駐外使館任職，經常與一些外交官夫婦打交道。我感到別國外交官的一言一行及他們身上所表現的一些特有潛能，有不少值得中國外交官學習與借鑒。在與他們的日常交往中，往往能增長不少見識。我自己的外交領域基本上在亞洲，與亞洲國家的外交官交往相對比較多些。

與我們夫婦同期駐文萊的泰國大使是富家子弟，性格內向，話不多，但只要打開話匣子，總愛講起趣聞典故，是位博覽群籍，談吐深遠的學者。有時他講話惹得別人捧腹大笑，而他自已卻表情平淡，若無其事。有一天我們夫婦參加一個宴會，不排坐位，我就湊到泰國大使旁邊就坐，想聽他說點笑話。那場宴會菜上得很慢，大家等得有點着急，就海闊天空地聊起天來。泰國大使問我，「潘女士，你知道什麼叫外交官嗎？」我說，「知道一些，不過我們可能有不同的版本，我想聽聽閣下的。」泰國大使慢條斯理地對我說，「一個外交官即使不想說話，也要考慮再三；一個外交官可以連續一周參加宴請，而不幹工作（其實宴請別人或接受宴請對外交官來說都是工作）；外交官可以記住女士的生日，但不知其芳齡（因爲根據國際禮儀，在外交場合男士不便打聽女士的年齡）；外交官總是多疑，如果你想欺騙一個外交官，你就對他說真話。」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關外交官的趣談，很感興趣。但說實在的僅聽一次，難以把全部內容都記住。於是，我請泰國大使把它寫下來給我，我想適時候拿出來「擺擺」。泰國大使辦事非常認真，第二天上午，他自己用很工整的英文，手寫了一個小條，把頭天晚上所說的内容都寫在上面，用信封裝好，讓司機送給我了。

過了幾天，泰國大使夫婦爲印尼大使夫婦舉行歡送宴會。我想機會來了，泰國大使給我寫的那個有關外交官的趣談小條可以派上用場了。宴會接近尾聲，開始娛樂節目。因爲我們夫婦在外圍圍坐，算是比較活躍的，有人首先拉我唱歌。我唱了



▲ 瓦爾德海姆爲聯合國第四任秘書長（一九七二至一九八二）

資料圖片

我喜歡的美國鄉村歌曲「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過去我一直把這個歌翻譯爲「帶我回家，鄉間小路」，後來我在北京一家卡拉OK歌廳的歌單上看到翻譯爲「故鄉之路」，我想這位譯者確實比我高一籌。接着在客人的要求下，我又唱了美國已故著名女歌手卡寶特唱過的「Yesterday Once More」，我在國外時把它翻譯爲「再現昨日」，可是國內翻譯爲「又見昔日」，比我又高明多了。在唱歌之前，我還學着來了點幽默，把泰國大使告訴我的那個趣談略加改造，編了一個「新版本」，相當於中國的小品。我這個人性格總的內向，在公共場合頂多唱個歌，哪有勇氣表演小品?!這次我鼓足了勁，一直克制自己不要「笑場」，好賴把這個「小品」表演下來了。我說，「我這個人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而不考慮再三；我可以連續一周接受宴請，但也要工作；我既知道女士的生日，也愛打聽女士的芳齡，因爲我自己就是女士；我不懷疑別人，特別是對在座的朋友。請不要對我說真話，我也不會對你們說真話，因爲我不想欺騙你們。看來，我不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官，當不了大使，只能當個大使夫人咯！」聽了我這番逗樂，在場的幾對大使夫婦哈哈大笑，他們的聲響對我是極大的鼓勵。我沒想到，自己身上竟然還有丁點兒演「小品」的潛能。那天晚上，我總共唱了兩隻歌，表演了一個「小品」，在場大使夫婦認爲我的表現十分給力，迎着泰國大使給我付「出場費」。我立馬打了個圓場，「出場費就不要啦！我們外交人員不能進行盈利性活動，是否請泰國大使唱個歌讓我們欣賞欣賞。」泰國大使果然嗓音不凡，他的精彩表演把那天的晚宴推向了高潮。

另一次，我與一位西方國家大使坐在一起，又談起什麼是「外交官」。該大使直言不諱地說：「外交官的哲學是不能講真話。」我說：「我在一本書上看到，十七世紀英國大使亨利·沃頓曾公開承認，大使就是派往國外爲了本國利益而說謊的說實人。十九世紀奧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說過，就他的策略，說真話就是對自己國

家的不忠。」該大使附和說：「是啊！西方傳統外交就是這樣，看來你讀了不少有關西方外交的書籍。」實際上，這一段是我從《中國外交官回憶錄》中看來的，現學現賣。接着我又說：「不過，我的先生自任大使後，我沒發現他撒過謊，特別是與朋友打交道時，總是願意坦誠相見。」說到這裏時，這位西方國家大使連聲說：「對！對！中國大使是這樣，因此我們很快成爲好朋友。」

還有一次，幾位大使夫婦在一起聚會，又談論到「外交官」應具備什麼素質，一位中東國家大使說了一個笑話。他說，某國一位新任大使要到一個君主制國家任職，帶了一對本國名貴的絲綢鳥準備送給該國國王。但到那個國家後，因爲水土不服，死了一隻，該大使深感惋惜，因爲鳥兒一般都是成雙成對，才顯得龍鳳呈祥，而孤鳥一隻送給人家國王，豈不是大殺風景。該大使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一招，讓他的下屬在當地抓了一隻類似的鳥，與那隻絲綢鳥放到一個鳥籠裏，高高興興地提着去觀見國王。偏偏那位國王是位細心人，他發現個中蹊蹺，納悶地問道：「閣下，怎麼這籠中的一隻鳥和我國的一種鳥一模一樣啊？」該大使急中生智說：「陛下，我國的絲綢鳥到了貴國，人生地不熟，語言不通，需要貴國的這隻鳥充當翻譯與嚮導」，國王聽了哈哈大笑，一場尷尬局面化解了。

不久前，我在一本書中讀到「聯合國秘書長的一分鐘外交演講」，這篇文章說的是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瓦爾德海姆的機敏應變能力及他對中國的友好感情，特別是對中國人民敬愛的周總理的無比敬重。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總理逝世時，設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門前的聯合國旗降了半旗，這是非常罕見的事。自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成立以來，世界上有多少國家的元首先後去世，聯合國還從來沒有爲誰下過半旗，少數國家對此感到不平。他們的外交官在聯合國大廈門前廣場上，言詞激憤地向聯合國總部發出質問：我們國家的元首去世，聯合國大旗升得高高的，中國的總理去世，爲什麼要爲他下半旗呢？

瓦爾德海姆理直氣壯地站出來，就在聯合國大廈門前的台階上發表了一次極短的演講，總共不過一分鐘。他說：爲了悼念周恩來，聯合國下半旗，這是我決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她的金銀財寶很多，她使用的人民幣數額也很大。可見，她的總理周恩來個人沒有一分錢的存款！二是中國有十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總理周恩來，沒有一個孩子。你們任何國家的元首，如能做到其中一條，在他逝世之日，聯合國總部將照樣爲他下半旗。

他說完轉身就走，留在廣場的外交官個個啞口無言。隨後響起了支持瓦爾德海姆的熱烈掌聲。瓦氏如此激情的講話，反映了敬愛的周總理的高尚品格是學世無雙的，同時也反映了瓦爾德海姆機智無比的外交才能。可見，要作一名出色的外交官，除了上述基本素質外，臨場發揮和隨機應變的本領是必不可少。

